



刘达临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世界当代性文化

SEXUAL BEHAVIOR
IN MODERN WORLD

SEXUAL
BEHAVIOR
IN MODERN
WORLD

世界当代性文化

刘达临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世界当代性文化

著 者/刘达临

责任编辑/林耀琛

装帧设计/桑吉芳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504 千字

印 张/20.125

印 数/1—11000

ISBN7 - 5426 - 1179 - 8
G·315 定价 34.80 元

前 言

近几年来,我下决心写一套关于性文化的书,目前,《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古代性文化》和《世界古代性文化》均已出版,再写成这一部书,我的这一心愿就算完成了。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人啊,要认识你自己。”从苏格拉底到现在,两千多年过去了,人对自己的认识还是相当不够的,不了解自身的性,不了解性的过去,也不全面地了解性的现在。而不了解性,就不能了解自身生活与延续后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不能快乐地、健康地、科学地生活;不了解过去,就不能更好地认识与指导现在和将来。至于现代的事情,有些人认为比较了解了,其实并不尽然,人们还有许多不了解的情况,有不少片面的认识、误导与偏见,都是需要加以澄清的。

写这一套古今中外性文化的书,难度很大。从纵的来看,上下五千年(如果从原始社会算起则有几百万年),时间太长;从横的来看,从中国到外国,地域实在太宽广,真是力所难及。我写这些书的决心,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从1989年至1990年,我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调查,1992年公开出版了调查报告。经建议,这本调查报告定名为《中国当代性文化》。

经过这一工作,我体会到中国人的性观念、性习俗、性行为受

传统的影响很深,要更好地认识今天,必须同时研究昨天,所以又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的性文化史,出版了《中国古代性文化》,这就有一些与前书“配套”之意了。

在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过程中,发现在中外的历史上性文化有许多共同的或相似的发展规律,为了进行对比,使这项研究不断深入,我又开始研究世界古代和现代的性文化,从中发现许多共同规律和相异之处。我做这件事可以说有些有利条件,近10年来,我访问了四个大洲的20几个国家和地区,有意识地搜集了这方面的许多资料,还有不少海外的朋友也帮我搜集,使我感到几千年来人类这方面的文化遗产实在太丰富了。

可是真正动笔写起来,困难却很大。这不仅因为涉及面太广,不好把握,更因为西方世界有许多事情实在复杂,对之如何分析理解,不太好处理。“自然主义”地报道一些事情是不行的,这本书要把读者引向何方?可是,如果扳起一副“左”的面孔,处处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这不科学,也不符合事实。所以,我采取的态度是确实有把握肯定的就肯定,确实有把握否定的就否定,而对另一些资料有必要引用又一时难以定论的,则留给读者自己去分析。

这本《世界当代性文化》从时间范围看,主要指20世纪,有些地方也要涉及一些19世纪中后期的事情。从地区范围来看,主要是指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全球各国家与地区,以欧美的性文化为主,因为欧美文化是当前世界文化的主流,在影响世界各国,中国的文化除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外,受欧美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放眼世界,研究这方面的文化确实大有好处。文化,有它的共同性。事实证明,外国的一切社会问题,例如卖淫、吸毒、黑社会以及离婚率上升等等,中国或迟或早地也在发生,同时中国还有不少异于外国的特点;应该如何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以发展自己,应该如何汲取西方社会的一些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从而使人们的性生活更加

幸福、健康与美好,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宗旨所在。

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要以许多科学的数据说明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同时也要使用不少个案,也许,这样才能更有理论性、可读性,也更能说明问题。我多次去国外,总感到天地太大,事情太多太复杂,而在国内这方面的信息是很不够的,在这本书里,我想选择一些典型的、有意义的、闻所未闻的事情介绍给读者朋友们,以开阔眼界。

写这本书,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踩着前人的脚印前进的。潘绥铭教授译的《金西报告》和《美国人的性生活》(即芝加哥大学性学调查报告)、张月副教授等译的《海特性学报告》、台湾王瑞琪女士等译的《新金西性学报告》等,都是写作本书极好的参考材料。上海的贾霁光医生、深圳的刘启华先生、香港的吴敏伦教授、澳洲的王平先生以及创建了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性学资料馆的赫伯乐教授等,都对我写作本书、搜集资料有极大的帮助,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并望本书的出版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同时也不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

刘达临

1998年4月17日

于上海

绪论：真理和谬误的反复

20 世纪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社会以惊人的速度陡然地加快了发展,经济在克服了一次次的危机以后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陷入了巨大的灾难,然后又进入恢复与发展;科学技术使人类进入了原子时代,又进入了电脑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急剧地变化着,生活方式也在急剧地变化着,这 100 年历史前进的步伐足足抵得上过去的 3000 年,那些世纪老人仿佛是从幼年生活的那个世界跨入到现在的另一个世界。这种巨大变化表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性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人们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方式上。

文化,当然有很大的民族差异性。但是,20 世纪世界的性文化是以欧美文化为主流,它在摆脱维多利亚时代性禁锢的历史重负的过程中向前发展。

在 19 世纪后期的维多利亚时代,性被看成是某种异己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勾当。那是一个无性的社会,对于“体面人”来说,大多数的性行为几乎都被视为反社会的,人们做这种事情时,总是怀着犯罪感,就像闯入了禁区。整个社会的道德变得生硬而压抑,社会风气变得矫矜而虚伪,结果是迫使性的欢悦转入地下:体面的上层女子置身于代表“纯洁”的台座上,变为“无性”;而那些沦为娼妓的女子却变得“没有人性”。男人则必须面对一种类似的分裂情

况,一个男子无法和妻子自由地享受性,虽然他可以自由地爱妻子;反之,一个男子也无法爱妓女,虽然他能够和妓女自由地享受性。这样,一种象征罪恶或羞耻的重负总是和性缠结在一起,无法解开。在那个时代,即使是人们认为是最代表科学的医生,也对性抱敌视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性对健康有危险,因为性交和自慰都会“伤身体”,又把性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都一古脑儿地算在一般性行为的帐上。

从19世纪末开始,一些思想先进的医生、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就对这种荒谬的社会现象发动攻击。历史的车轮进入了20世纪,维多利亚式的性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①但是其影响犹存。不少较为激进的性学家都在社会保守势力的打击下经历了坎坷的命运,例如那位首先要研究人类性反应的华生教授就惨遭灭顶之灾。直到40年代末,《纽约时报》还拒绝为金西的《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刊登广告。直到60年代初,在大学中开设有关人类性行为的课程还是不可想像的。

可是,社会还是在缓慢地前进着。在20世纪早期,对性的讨论多起来了,而且涉及以前为人们所避免的题材。这些内容超越了那些与婚姻的性有关的标准话题,例如:如何将婚姻的要求结合以性变化的需要;同性恋以及其它被认为偏差的行为,现在则被认为是居于一般人类经验的领域。在一些先进的思想理论的影响之下,性的主题从隐秘的状态中出现,开始渗入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各个层面的学术与文化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重大事件,加速了那些已经在酝酿中的变化。避孕的知识增加了,并且更多的人置身于都市生活较不为人知的状态中,于是进一步促成了性行为的转变。这方面最明显的变化是:1916年至1930年之间,女子的婚前性行为增加了,根

^①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于1837年登基,1901年去世。

据全面的抽样调查,出生于1900年以前的女人中,不到一半的人像出生于以后任何10年中的女人那样有婚前性交行为(在25岁的未婚女子中,比率是14%比36%);婚前的爱抚行为也有类似的增加。男子最重要的变化是,他们和妓女性关系的频率降低到前一代的一半。

现在人们都认为,20世纪在西方社会发生的“性革命”是从60年代开始的,而忽略了喧嚣的20年代在较年轻的一代中已经开始造成了一种“性革命”。这些事件所产生的惊慌与兴奋的感觉在两位社会评论家于1929年所写的评论中有生动的描述:^①

较年轻的一代所表现的行为,就像一个疯狂的人在一个清醒的时刻中忽然体认到:主事的医生也全是精神错乱的。长辈们长久以来一直是文明的神圣保护人,现在却表现得很拙劣,以至于永远不再对世界的年轻人具有节制和稳健的影响力。教会无法以尊严和坦诚的态度处理“性”以及自然的冲动,这是我们在这个狂热的时代所面临的“个人礼节之解体”的最重要事实:钟摆不可避免地“从‘隐藏’摆向‘暴露狂’,从‘压抑’摆向‘发泄’,从‘沉默’摆向‘公开’,从‘谦逊’摆向‘粗俗’”。这种革命性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基本上是健全的——尽管显得粗鲁和怪异。

这段论述中所指的“较年轻的一代”,就是经历了60年代“性革命”的年轻人的祖父母。

可是,这种初露端倪的“性革命”却受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30年代前期上台的德国纳粹分子扭曲人性,而且企图扭曲世界。希特勒本身就是一个性施虐狂,又是一个性受虐狂;纳粹分子疯狂地反对与迫害犹太人、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和性学家,成千上万

^① 卡维顿和希玛豪森所著:《文明中的性》。

的犹太人和同性恋者死于纳粹的枪下或集中营中,性学机构被查封、破坏,一些著名的性学家被迫逃亡,在德寇铁蹄所到之处没有性学的立足之地。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也使人们以更加现实、更加严肃的态度对待生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方兴未艾的“性革命”陷入了低潮。

战争的烟云过去以后,一切都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大发展使人们更加向往自由和快乐;避孕和其它生殖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性活动更无后顾之忧;40年代至50年代金西的大规模的性调查,60年代玛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类性反应研究,再加上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自由哲学和马尔库塞的性欲理论的影响,使人们揭去了长期笼罩在性问题上神秘的、保守的面纱,给传统的性观念以致命的打击。正像瓜熟蒂落,也正像经过了十月怀胎与长时间的阵痛后的一朝分娩,酝酿已久的“性革命”又以更大的深度与广度开始了。

“性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对传统的性道德、性行为方式和婚姻形式的反叛。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在“性革命”的浪潮中,性问题从“外在”向“内在”的转化加快了,在文化和个人两个方面都受到了更加热切的关注。影响社会变迁的力量(例如女权主义运动),造成了对性问题地位的再评价。性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不仅包括两性关系的观念,而且包括性行为方式的观念。人们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胆地去追求性的自由和性的快乐。

应该认为,西方的“性革命”是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人们渴望从欧洲中世纪、清教徒运动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禁锢中彻底地解放出来,打破传统的性保守主义的传统,从生活中得到最大的自由、快乐和幸福。“性革命”的浪潮几乎影响到全世界。可是,只要真理向前多迈出一步,只是按同方向多迈

出一小步,就会变为谬误,“性革命”也是同样。当时有许多青年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小家庭生活方式,许多青年男女公开同居,把结合与离异视为儿戏。有些青年还聚居在一起,组成“大家庭”,过群婚乱交的生活。当时还出现了许多婚姻模式,如同性恋婚姻、合同婚姻、连续婚姻和家庭群等等。60年代末,在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高潮中,甚至有几千名男女大学生上街裸体游行,以表示对传统的性观念的蔑视。性的泛滥冲破了种族、年龄、宗教、教育的一切堤防,几乎湮没了整个社会。

这场震撼西方社会的“性革命”越走越远了,它前后喧闹了10多年之久,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家庭的解体,婚姻关系的松散,结婚人数的减少,性关系的紊乱,特别是艾滋病的流行给社会和人们带来了许多痛苦和不幸。“性革命”本来是一场人性的解放运动,后来却形成了惨重的历史教训。80年代以后,在事实的教育下,人们在性问题上的价值观又拨转发展方向,向传统作某种程度的复归,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小家庭的温馨,建立正常的婚姻关系又成为时尚,青年们开始以较为严肃的态度对待两性关系,把性爱和责任结合起来,人们称之为“性回归”。

综观20世纪的世界,性文化是在性禁锢和性放纵的反复中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性的领域也显示出它的作用。真理向前多迈出了一步变成了谬误,于是人们修正谬误,进一步地探索真理,追求真理。

无论是性禁锢和性放纵,都是人们对性的社会控制的一种态度和做法。性禁锢和性放纵的反复,实际上是性的社会控制的宽严度的反复。

人类的性有其自然性,自然性即本能,它使性成为一种个人行为,趋向于开放、自由和随心所欲;人类的性又有其社会性,也就是说,性行为会受社会环境的熏陶与影响,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利益并接受社会的控制,这又使性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它趋向于约束和限

制。这两者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人类的性文化就是在这矛盾和统一的过程中徘徊与发展,20 世纪的世界性文化也是在这矛盾和统一的过程中徘徊与发展的。

人类社会从早期开始,对性行为就有一定的规范,并且将不同的判断加于性行为之上,这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如果一切性的冲动都不加抑阻,任其自由泛滥,那么社会就会解体。即使在群婚杂交的情况下,也存在各种性禁忌,例如生产禁忌和以后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乱伦禁忌,这些禁忌就是一种限制,是社会对性的控制。以后,随着性文化的发展,性的社会控制的方式则是经由规范的集合或配置,即所谓制度,所有的社会都以各种方式将性制度化,婚姻制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的实质就是把人类的性行为限制在婚姻关系范围之内。历史发展到今天,性的社会控制已经发展为一整套复杂的、严密的网络,包括法律控制、道德控制、知识引导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它们通过强制的或非强制的手段,使人们的性行为必须符合社会规范。

然而,性的社会控制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度,有它很大的时代、民族和社会的差异,即使在同一时代、社会、民族的范围内,对此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与做法。在 20 世纪,“在不影响社会发展、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应当保障人们有充分的性的自由与快乐”的这一原则是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然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却使人们长期处于困惑之中,控制过严会形成性禁锢,控制过宽会形成性放纵,于是社会要不断地调整、变化,形成了不断的反复,这正像一艘在大海中驶行的航船,需要将舵不断地向左向右调整,在 20 世纪,这种调整的幅度是十分巨大的。

综观人类历史,对性的社会控制的模式具有以下四种典型的方式:

一是传统的控制模式。

传统的宗教信仰认为,性是肉体的冲动,而肉体正是人类堕落

的产物,肉体代表着和精神相对立的兽性,而性冲动正是罪恶肉体的潜在罪恶性质的基本证据。他们把性看成是一种“原罪”,是一种导致社会灾难的力量。人有易受诱惑的弱点,根据这种观点,如不加控制,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受蛇的诱惑那样,去做与性有关的邪恶的事情。这一理论形成了所谓纯粹控制模式,根据这一模式,人们应该对性无知,不断地被告知性的内在邪恶以提高人的觉悟,如果不守规矩就要受惩罚。

二是弗洛伊德学派的控制模式。

弗洛伊德模式吸收了大量传统基督教的内容。它认为性是一种和社会文明相对立的力量,家庭的功能就在于把还留在原始状态的、只关心个人快乐的婴儿训练成符合社会要求的人。父母的责任在于向孩子灌输现实的原则(弗洛伊德主义的“超我”相当于基督教的觉悟),以控制他们的性冲动。弗洛伊德坚信,人性的真实本质是同文明相对立的,只有通过压抑和控制,性能源才能被利用来为文明服务。和基督教传统不同的是,基督教传统提倡对性的政治与社会压抑,而弗洛伊德则强调对性的心理压抑。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说过:“肉体爱的欢悦是最大也是最强烈的欢悦——但也是最不理性的欢悦。”弗洛伊德学派似乎继承与发展了这一思想。

三是社会学的控制模式。

社会学认为,初生的婴儿只是一个“自然人”,和动物没有多大区别;只有接受社会的教化,使人“社会化”,学习人的语言、谋生技能、习惯作风,接受社会规范,才能成为“社会人”,在性方面也是如此。因此,社会的性的秩序,是由社会化、机构控制及法律体系来维持的。

近来,从社会学的控制模式中又派生出一种学习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环境因素,它认为性并非源于自然,而来自有机体的学习活动,人作为一个逐步成长的有机体,其行为受到环境的不断塑造。

学习者基本上是被动的,人们在性发展过程中的失误,必然可以从错误的环境影响中找到原因,所以,要控制人的性行为,首先要控制环境的影响。

文化学习模式则把环境的影响看成是社会文化的影响。当人出生于某一文化或社会中时,他就进入了一个了解周围世界的符号和意义的过程,从而了解自我,发展自我认同感,并活跃地参与了自我的塑造。人并不仅仅是受环境影响的被动对象,而是有目的、有倾向性的造物,自己选择并创造意义,选择行为方式,主动参与其周围环境的形成。文化塑造了人的性环境,人也通过自己给性赋予意义来创造自己的性本质。

四是崇尚自然的模式。

西塞罗说过:“人们的幸福是主要的法律。”崇尚自然的模式奉行这一原则,主张允许儿童和成人自由地表达“自然的”性本能,让性自由奔放,使人们能在没有任何压抑的条件下得到性的快乐。这个模式认为,性的扭曲并不是因为社会化及压抑的缺乏,而恰恰源于对性的社会化与压抑的企图;性本能是优良的本能,如果对它加以抑制,就会使它离开其“自然过程”,而性开放将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人类。他们同意文明与人的本性相对立这一观点,但在他们看来,文明却是有罪的一方,它扭曲和压抑了天真无邪的性冲动。

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地探索对性的控制模式,在 20 世纪也是同样。在 20 世纪前期还有很大影响的传统的控制模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种谬误,而且日益被人们厌恶和抛弃。在西方社会实行“性革命”的过程中,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又选择了崇尚自然的模式,这种模式似乎和传统的控制模式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可是过犹不及,这个风行一时、被认为是真理的模式也被历史证明是谬误,于是又出现了“性回归”,把摆过了头的“钟摆”再摆回去,对性的控制模式再作一些聪明一些的选择。在这个真理与谬误相互转化、人们对性控制模式反复选择的过程中构成了性文

化的主体,性文化向前发展,人们对性控制模式的选择也会越来越成熟。

从世界范围看,文化有其趋同性,性文化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全人类都有共同的性本能与性兴趣,而影响性行为的社会因素及其发展规律也是共同的。当然,这并不否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其不同的性文化特点,共性通过个性而起作用。如今看来,国外发生着的一些社会问题中国都在发生,西方社会发生过的“性革命”在 20 年后的中国也有一些冒头,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也要不断地对性控制模式进行探索 and 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一些世界当代性文化的发展规律,定会大大促进我们社会的文明建设。



作者近照（1998年7月于柏林菩提树下大街，这里的环境体现了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结合）

（这照片右方为有200多年历史的皇家大剧院，街头则有汽车，有古代与现代化交融的文化含义）



快乐的交往



永恒的爱

印度人的婚礼